

全球南方重组下阿拉伯世界的角色再定位^{*}

马晓美 丁 隆

摘 要：全球南方重组与全球治理多中心化演进，促使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身份由象征性认同转向制度化实践。依托能源—金融资本、文明资源与地缘枢纽优势，阿拉伯国家拓展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空间；在回应结构性不平等与治理赤字过程中，推动南南合作由政治认同迈向制度协同；在多边平台拓展、绿色转型与气候治理、文明对话及安全合作等领域发挥议程协调与规范中介作用，促进南方诉求向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转化。这一过程既体现阿拉伯国家由规则接受者向制度参与者、协调者和供给者的角色转变，也展现出其在全球南方合作与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制度能动性。然而，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制度异质性、外部规则约束、能源转型压力及地缘安全竞争，仍制约其制度影响力的提升。阿拉伯世界在资源优势、制度实践与规范协调之间逐步形成互动逻辑，其角色再定位既反映出全球南方重塑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也揭示了制度转型与治理参与过程中面临的现实约束。

关 键 词：阿拉伯世界；全球南方；规范中介化；制度再嵌入；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马晓美，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兰州 730030）；丁隆，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4-0086-2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经济转型发展研究”（22JJD790053）的阶段性成果。

21 世纪以来,国际力量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全球南方作为兼具历史记忆、政治身份与制度诉求的复合性概念,日益成为理解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视角。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理或经济分类,而是在反殖民、去依附和发展权诉求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与制度行动空间。^① 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多极化趋势加速以及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显现,南方国家不再只是国际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机制创新、规则协调和议程塑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多元、包容和均衡的方向演进。

既有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讨论全球南方的兴起。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发展不平等、结构依附和世界体系分化,揭示南方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制度权力中的不利位置。^② 第二,后殖民与知识生产研究关注南方身份、话语抵抗和知识去中心化,^③ 强调全球南方对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秩序的反思与修正。^④ 第三,全球治理研究聚焦南南合作、多边机制改革和新兴国家制度参与,认为南方国家正通过发展融资、基础设施合作、气候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制度影响力。^⑤ 这些研究为理解全球南方的历史基础、规范诉求和制度实践提供了重要解释,但对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南方重组中的角色变化关注不足。

长期以来,阿拉伯世界多被置于地区冲突、能源政治、威权治理和安全困境等框架下加以分析。相关研究较多关注巴以问题、海湾安全、政治转型、宗教政治和大国竞争,较少将阿拉伯国家视为全球南方的重要行动主体,考察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实践与角色变化。这种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阿拉伯例外论”的解释路径,易将阿拉伯世界理解为治理危机和安全问题的集中区域,而忽视其在南南合作、规则协调、发展融资和议程塑造中的能动作用。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哈利迪(Rashid Khalidi)关于阿拉伯去殖民经验的研究,以及英

①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105–108.

②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1–12, 149–172; André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Vol. 18, No. 4, 1966, pp. 17–31

③ Edward Wadie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Justice Against Epistemicide*, pp. 105–108.

④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 11, No. 1, 2012, pp. 12–13.

⑤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1, No. 3, 2017, pp. 271–285;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No. 4, 2014, pp. 647–659.

国学者雷蒙德(Raymond Hinnebusch)、埃及学者柯拉尼(Bahgat Korany)等人对“阿拉伯例外论”的批评,^①均表明阿拉伯世界并非全球南方政治演进的边缘对象,而是兼具历史主体性与制度能动性的区域力量。

从 20 世纪中叶反殖民运动、泛阿拉伯主义和不结盟实践,到当代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议程拓展,阿拉伯国家持续以不同方式介入全球南方合作进程。随着全球治理多中心化演进,发展融资、气候治理与能源安全等议题日益凸显,南方国家间制度互动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部分阿拉伯国家依托能源—金融资本、文明资源和地缘枢纽优势,不断拓展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空间,并在规则协商、议题塑造和资源配置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容、全球发展倡议及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为其推动南方诉求进入国际议程提供了重要制度空间。由此,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身份正在由反殖民记忆和象征性认同,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实践。^②

然而,该变化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已形成统一的南方行动主体,区域内部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和对外战略仍存在明显差异。海湾国家更多依托能源资本、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网络拓展跨区域影响力,并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融资增强其制度参与能力;^③北非国家在文明交流、发展合作和区域联通中发挥作用;黎凡特地区受安全困境和外部干预影响更深,其制度参与能力相对受限。这种分化使阿拉伯世界呈现出南方身份与中层权力并存、去殖民诉求与国家利益交织、南南合作与南北互动并行的复杂格局。

基于此,本文将阿拉伯世界置于全球南方重组与全球治理转型的双重背景下,重点考察其南方身份如何由象征性认同走向制度化实践,以及这种转变如何推动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再定位。文章以规范中介化与角色再定位为分析主轴,前者指阿拉伯国家在多边机制扩展过程中,通过议题框架、规则倡议与政策转译,将南方关切转化为可进入国际议程的规范表达,并在不同制度空间之间发挥桥接与协调作用;后者指其由长期被视为规则受体的外围位置,逐步转向具备制度进入、公共产品供给与规范生产能力的中层制度行动者。由此,本文关注以

① Rashid Khalidi, *Resurrecting Empire: Western Footprints and America's Perilous Path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4, pp. 1–24, 145–165; Raymond Hinnebusc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18, 231–248; Bahgat Korany and Ali E. Hillal Dessouki,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rab States: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0, pp. 29–46.

② Gilbert Achcar, *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 232–235.

③ Robert Mason and Simon Mabon eds.,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ests, Influences and Instabil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53–78.

下问题:阿拉伯世界的全球南方身份如何演化?其制度能动性通过何种机制展开?其角色转型面临哪些结构性约束,又将如何影响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能力?

一、南方身份的历史演化:从政治动员到制度实践

理解阿拉伯国家如何在全球南方重组中通过规范中介化实现角色再定位,有必要回溯其身份形成与制度实践的历史谱系。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身份并非静态的地理指称或文化标签,而是在去殖民化、民族国家建构与全球治理变迁进程中持续生成的政治身份与制度定位。从反殖民动员和第三世界团结,到泛阿拉伯主义的制度尝试,再到当代全球治理中的机制嵌入与议题协调,其实践重心逐步由象征性动员转向制度化参与。由此,阿拉伯国家的南方身份体现为资源、制度与话语互动塑造的动态过程,其核心特征在于由政治认同向制度实践的演进。

(一) 去殖民背景下的政治动员:南方身份的生成逻辑

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身份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至中期去殖民进程与民族国家重构之中。奥斯曼帝国瓦解与英法殖民秩序确立,使阿拉伯地区被纳入“帝国中心—殖民边缘”的权力结构。殖民治理通过疆域重划、行政分治与制度移植重塑地方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削弱既有整合机制的同时,加深制度依附与社会分化。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主体性问题被重新提出,以“群体凝聚力”(al-aṣabiyyah)^①为核心的社会纽带重新获得政治动员功能,并逐步与更广泛的第三世界处境相联结。

随着民族主义思潮扩散,反殖运动的政治诉求逐步凝结为以主权、自决与尊严为核心的集体意识。^②去殖民化并非简单复制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而是在历史经验与文化资源基础上对政治共同体的再组织。埃及、阿尔及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地的持续性动员和组织化斗争,强化了阿拉伯世界对共同历史处境的认知。

20世纪中期,反殖诉求由精英主导扩展至更广泛社会层面,并呈现跨区域联结趋势。埃及“自由军官运动”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标志着反殖政治由动员阶段向国家建构阶段推进;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超越地区边界的制度化政治舞台。^③跨区域会议与合作机制,使反殖经验转译为第三世

①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阿拉伯文),伊赫桑·阿巴斯校订,贝鲁特:萨德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97-116页。

②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6-72.

③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p. 230-232.

界政治的共享规范,区域性抵抗由此获得全球南方层面的规范表达。

这一阶段形成的南方身份具有鲜明的政治动员特征。阿拉伯国家主要通过外交声明、会议协调与联合立场嵌入第三世界政治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能见度与道义正当性,但制度层面的机制供给相对有限。这种以象征性团结与议题共识为主的行动模式,既为后续制度实践提供动员基础,也塑造了冷战时期“议题强而机制弱”的结构特征。

(二) 泛阿拉伯主义的制度探索及其局限

政治独立后,泛阿拉伯主义发展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边界、整合地区力量的政治理念。基于共同语言、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该理念既回应殖民分割造成的政治碎片化,也承载通过区域团结提升集体行动能力的制度期待。阿拉伯国家联盟 1945 年成立,标志着泛阿拉伯主义走向制度化,即在主权国家框架内构建协调机制,塑造共同立场并提升对外谈判能力。

实践层面,阿盟通过联合声明、外交协调与定期会议,在巴勒斯坦问题、反殖民议题及部分地区冲突中持续强化集体立场,为相关诉求争取道义支持与国际关注。此类制度实践强化了政治动员与规范表达,使阿拉伯国家得以在冷战国际舞台上以相对一致的姿态参与第三世界政治议程。

然而,泛阿拉伯主义的制度实践很快暴露内在局限。成员国政治制度差异、国家利益分化、政权安全考量以及对外战略取向不一,使区域协调机制难以形成稳定高效的执行能力。^① 冷战格局下,阿拉伯国家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分属不同阵营,进一步削弱政策一致性,导致阿盟在关键议题上多停留于协商与表态,难以提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与公共产品。^②

资源条件改善也未能转化为持久治理能力。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后,阿拉伯国家凭借能源资源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得显著话语空间,资源治理一度被视为集体行动杠杆。但区域内部财政结构、产业模式与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加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外部大国力量的持续影响,使资源优势难以自动转化为稳定的区域协调能力和长期制度影响力。^③ 与此同时,基层社会仍通过社

① Louise Fawcet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51-170.

② Asef Bayat,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8-184.

③ Adam Hanieh, *Money, Markets, and Monarchies: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3-101, 177-212.

区组织、宗教网络与非正式动员维系社会凝聚力,^①为后续制度实践提供潜在资源,但其政治影响力在冷战时期尚未形成稳定制度出口。

总体而言,泛阿拉伯主义推动的制度化更接近以象征性整合与议题动员为主的区域合作形态,而非以功能性治理与公共产品供给为核心的制度体系。^②它提升了阿拉伯世界的集体身份与政治能见度,却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合作中执行力不足、协调成本高企与外部结构制约等问题。

(三) 冷战时期的规范塑造与制度供给

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并非仅以政治动员或身份叙事介入第三世界政治,其规范影响与制度实践主要通过区域政治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宗教—文明平台和国家外交实践展开。在两极对抗的国际结构下,这些路径在不同程度上将反殖民、经济主权与第三世界团结等议题转化为可识别的制度实践,并使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政治中保持持续能见度。但从运行效果看,这一时期仍呈现“议题动员较强,机制供给有限”的结构特征。

阿盟在规范塑造层面的核心功能,是为反殖民、反占领与民族自决议题提供制度化表达渠道。通过首脑会议、部长级磋商与联合声明,阿盟在巴勒斯坦问题及部分地区冲突中反复重申集体立场,并推动相关议题进入联合国等国际场域。这种表达强化了阿拉伯世界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道义位置,但受成员国政治分歧、外部战略牵制和执行机制薄弱影响,阿盟在冲突调解、集体安全和经济统筹等领域多停留于协调与表态,^③难以稳定产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工具。

相较政治协调领域的制度局限,资源治理机制更集中体现阿拉伯国家的制度供给潜力。欧佩克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产量协调、价格谈判与市场预期管理,将能源议题从技术性经济事务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制度议题,并将资源主权、公平交换和发展权纳入国际政治经济讨论,成为第三世界批判既有经济秩序的重要规范资源。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能源治理的制度地位显著上升,阿拉伯国家由此获得空前的话语空间。然而,这种影响高度依赖资源禀赋与市场周期,并受成员国财政结构、产业布局与对外战略差异制约;国际金

^① Asef Bayat,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pp. 58–83, 215–236.

^②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8, 147–182, 252–291; Marc Lynch, *The New Arab Wars: Uprisings and Anarchy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6, pp. 1–22, 233–260.

^③ Don Peretz, “Nonalignment in the Arab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62, 1965, pp. 36–43.

融体系与大国博弈对能源市场的深度嵌入,亦限制规则创新的外溢范围。阿拉伯国家的资源治理因而更多体现为阶段性制度杠杆,难以在多领域稳定提供长效治理工具。^①

宗教—文明平台构成阿拉伯世界参与第三世界政治的补充路径。伊斯兰合作组织及跨国宗教网络通过强调宗教共同体、文明认同与道义责任,在巴勒斯坦问题与反殖民议题上强化政治诉求的合法性,并为跨区域南方团结提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身份纽带。相较于区域政治组织与资源治理机制,宗教—文明平台的制度功能更集中于议题聚合与规范赋权。通过会议决议与联合声明,将特定政治议题嵌入更具普遍意义的宗教与文明叙事,从而提升相关诉求在国际舆论与第三世界政治中的道义正当性。但由于缺乏稳定执行机制、政策工具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制度实践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安排,^②其影响更多停留于象征支持与话语协调,难以形成持续治理输出。

除既有组织路径外,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国通过不结盟运动、亚非合作及反殖民外交,在第三世界政治中发挥规范性领导作用。它们推动政治独立、经济主权与反支配原则,并通过议题倡议与外交联结,提升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南方政治中的能见度。埃及在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早期阶段及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过程中,体现出将区域经验转译为第三世界共同议题的能力。然而,这类国家主导实践主要依托外交话语、会议动员与政治象征,其持续性和制度外溢能力受国内政治动荡、领导层意愿不足、区域冲突和冷战阵营逻辑制约,难以沉淀为稳定的跨国制度安排。

总体而言,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通过区域政治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宗教—文明平台和国家外交实践,在第三世界政治中形成若干连续性制度尝试,并在部分议题上产生实际影响。但从制度运行结构看,规范诉求能够凝聚共识,却难以持续转化为稳定治理工具与公共产品。两极格局、外部干预与区域内部差异共同强化这一结构,使阿拉伯国家的南方身份在较长时期主要依托政治动员与道义表达维系,制度实践难以形成持续积累与功能深化。冷战时期的制度经验既构成其参与第三世界政治的重要历史基础,也内含制度实践亟需转型的张力。

(四) 历史转型的制度意涵：从冷战到当代

进入 21 世纪,全球治理结构从单极向多极、多中心演化,多边机制扩展带来议题密度与制度复杂性上升,全球南方合作逐步从政治立场表达转向制度化运

^① Giuliano Garavini, *The Rise and Fall of OPEC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Academic, online edn, 2019, pp. 88–134.

^② Tajwar Ali and Haseena Sultan, “Emerging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1969,”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Vol. 10, No. 1, 2023, pp. 1–18.

作,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新的结构窗口与行动空间。在此转变中,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由“是否参与”转为“如何在高度制度化环境中重组行动方式与制度功能”,以形成持续且可预期的影响。相较于冷战时期以政治动员和象征性整合为主的路径,当代制度实践更强调以工具、平台和机制嵌入实现治理参与;南方身份的呈现也由政治立场的外显,转向围绕具体议题的功能分工与制度定位。

从制度含义看,转型集中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政治层面,部分阿拉伯国家由以立场宣示为主的抵抗性外交,转向以斡旋、调解与议程协调为核心的中介实践,^①通过场域搭建、议程塑造与方案撮合参与冲突调解与危机治理,^②并在此过程中积累制度信誉与议程影响力。经济层面,能源与金融资本不再主要以资源性权力象征出现,而经由主权财富基金、跨区域投资网络与绿色金融机制,被转译为更具可持续性的治理资源,^③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融资体系与能源转型进程。制度与规范层面,阿拉伯国家逐步由被动参与者转向在特定议题上具备方案供给与规范倡议能力的中层制度行动者,^④其制度实践呈现示范、扩散与在地化并行的特征。

但这一转型并未在区域内同步推进。国家间能力差异、区域冲突外溢、治理合法性争议及外部规范与技术门槛,持续制约制度供给的稳定性与外溢性。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制度实践更接近分层化、议题差异化的演进形态,部分领域形成相对稳固的制度存在,其他领域仍高度依赖外部结构。为更直观呈现冷战与当代阿拉伯世界制度实践在行动方式与功能取向上的差异,表1从全球结构背景、制度载体与规范功能等维度作对照,以便将制度转型由概念性判断落实为可观察的结构变化。

表1 冷战时期与当代阿拉伯世界制度实践的结构比较

比较维度	冷战时期	当代阶段
全球结构背景	两极对抗、阵营政治	多极化、多中心治理

① Gilbert Achcar, *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 232–235.

② Jörg Friedrichs and Oliver Schlumberger, “The Gulf States as Norm Entrepreneurs: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Hegemonic Proje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2, 2021, pp. 337–356.

③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ests, Influence and Instability*, London: Hurst, 2020, pp. 61–89.

④ Elizabeth Sidiropoulos, “The Global South in Transition: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9, No. 2, 2022, pp. 127–144.

(续表)

比较维度	冷战时期	当代阶段
南方身份表现	反殖民与第三世界政治立场	制度化参与和议题分工
主要行动方式	政治动员、象征性整合	工具化治理、机制嵌入
核心制度载体	区域组织、资源联盟、国家外交	多边机制、融资平台、软法规范、规则倡议
规范核心	反殖民、民族自决、经济主权	发展融资、气候正义、斡旋外交、数字治理
规范功能	议题表达、道义动员	议程设置、方案供给
制度供给能力	有限、间歇性	分层化、议题差异化
主要制约因素	阵营分化、执行力不足	合法性争议、能力差异、资源依赖、外部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体而言,阿拉伯世界南方身份的形成与演化,并非线性展开的政治自觉过程,而是在反殖民经验、民族国家建构、区域组织化与全球结构变迁的交织中,由政治动员走向制度实践的历史进程。去殖民时期的反殖动员与第三世界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身份叙事与道义资源;泛阿拉伯主义及冷战时期的制度尝试,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南方身份转译为规范表达与组织实践,但受制于阵营分化、能力差异与外部干预,其制度实践长期呈现出“议题动员强而机制供给弱”的结构特征。

这一历史结构既塑造了阿拉伯世界参与全球南方政治的基本方式,也内含其制度实践难以持续深化的约束条件。随着全球治理环境由政治对抗型秩序转向高度制度化、多中心运作,单纯依赖象征性动员与道义表达已难以支撑持续影响。阿拉伯世界的南方身份由此在既有规范资源基础上发生重组,其参与方式逐步转向以制度角色实现治理嵌入,并呈现出更具工具性、嵌入性与功能分工特征的实践取向。这一转向既勾勒出阿拉伯世界制度实践的历史边界,也为理解当代规范中介化路径提供了关键结构条件。

二、多边机制中的规范中介：制度再嵌入与角色分层

进入 21 世纪,全球治理在多极化与多中心化趋势下加速重组。既有国际制度面临代表性不足与治理绩效下降等挑战,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发展融资、数字治理与冲突调解等跨国议题的复杂化,推动南南合作由政治立场表达转向制度化运作与公共产品供给。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变化不在于身份认同的重申,而在于制度参与方式的转型。依托资源禀赋、地缘枢纽与外交网络,部分阿拉伯国家通过多边机制扩展、跨区域合作和功能性嵌入,逐步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制度供给、议程塑造和规范协调能力,^①并在全球治理中形成差异化、分层化的制度角色。与此同时,区域内部能力差异、合法性争议、资源依赖和外部规则约束,也持续限制其制度影响力的扩展与稳定化。

(一) 再嵌入的结构条件:全球南方重组与机会窗口

当代全球治理正经历由单一中心主导向多主体参与的结构转型。随着多边机制扩容和合作平台多样化发展,全球南方逐步由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转向制度重构的重要参与者。相较于冷战时期依赖统一阵线的代表性参与模式,当代治理更强调基于资源禀赋、治理能力和外交网络的功能性嵌入,为阿拉伯国家参与规则协商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②

这一结构变化重塑了阿拉伯国家进入全球治理的基本条件。制度碎片化与多边平台并存并未削弱全球治理中的规则约束与合规要求,但治理平台和制度场域的多元化增加了制度参与渠道,从而降低了行为体进入治理过程的门槛,使中等力量能够通过议题选择与机制嵌入实现制度地位的重新配置。资源和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更容易在多边机制中形成枢纽位置,而冲突国家或制度能力较弱者则更多依赖外部平台获得有限参与机会。以金砖合作机制扩容为代表的新型多边平台,虽拓展了阿拉伯国家进入发展融资与全球经济治理议程的制度空间,^③却并未消解区域内部差异,反而使不同国家依据资源禀赋、制度能力与外交战略形成差异化的制度嵌入路径。

基于此,阿拉伯国家的制度再嵌入并非整体性、均质化过程,而是在国家能力、资源禀赋和议题领域之间呈现不对称扩展。^④它为阿拉伯国家通过规则转译和议题桥接承担规范中介角色提供了结构条件,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稳定的制度能动性,仍取决于资源转译、战略选择与规范能力的进一步制度化。

(二) 再嵌入的动力机制:结构、资源与主体

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重组中实现制度再嵌入,主要受到结构性、资源性与主体性三重动力驱动。结构性动因源于全球治理合法性赤字与制度供给方式转

① Mohamed Bin Huwaidin, "BRICS: What Is in It for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 12, No. 3, 2025, pp. 364-378.

②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2, pp. 29-32.

③ "BRICS Expans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from Member States, Partners, and Aspiran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31,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3/brics-expansion-and-the-future-of-world-order-perspectives-from-member-states-partners-and-aspirants>, 上网时间:2025年8月5日。

④ Robert Mason and Simon Mabon eds.,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ests, Influences and Instabil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95-118.

型。既有国际制度在发展融资、气候责任分担与冲突治理等议题上的绩效不足,推动多边机制扩容与功能平台重构,使南方国家获得参与规则协商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现实通道。制度参与由此不再局限于立场表达,而逐步体现为通过机制嵌入参与治理实践,从而提高制度进入的边际收益。

资源性动因构成制度能动性的物质基础。能源资源赋予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结构地位,长期塑造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基础。而在当代,这一优势通过主权财富基金、跨区域投资网络与绿色金融工具实现制度化转译。资源不再只是谈判筹码或政治杠杆,而被嵌入发展融资、气候金融与基础设施合作等制度安排中,转化为相对可持续的制度供给能力,从而将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能力和制度影响力。^①

主体性动因则体现为部分阿拉伯国家对国家战略与外交路径的主动调整。以经济多元化、声誉管理与风险分散外交为导向的战略转型,使其通过制度嵌入实现战略自主与安全对冲。与此同时,调解外交与危机治理中的持续介入,也使其积累制度信誉,并将实践贡献转化为机制黏性,推动国家由地区性议题参与者向跨议题治理行动者转变。

三类动因的相互作用,使阿拉伯国家能够将结构性机会与资源优势转化为制度实践,并推动其在不同机制与议题中的角色分化。由此,制度再嵌入不只是外部结构变化的被动结果,而是结构压力、资源转译与战略选择共同塑造的制度过程。

(三) 制度能动性的分层展开: 规范塑造与制度供给

阿拉伯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制度能动性,并非体现为对既有规范体系的整体性重塑,而是通过议题选择、资源转译和制度实践,在不同治理领域中形成分层化、功能化的作用。其制度作用大体可分为制度供给型、议程塑形型和规范中介型三种路径。

第一,制度供给型路径主要体现在绿色转型、低碳基础设施和气候金融等与资源转型高度相关的领域。依托能源禀赋、主权财富基金^②和区域金融基础设施,^③

①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Gulf States," *Austral: 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2012, pp. 103-123.

② [科威特]图鲁斯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主权财富基金及其在科威特与海湾经济中的作用》(阿拉伯文),载《图鲁斯》,2025年3月23日, <https://torouscenter.com/?p=12843>, 上网时间:2025年4月5日。

③ Kudakwashe Muzoriwa, "How GCC Sovereign Funds Are Dominating the World," *Gulf Business*, August 2, 2024, <https://gulfbusiness.com/how-gcc-wealth-funds-are-dominating-the-world>, 上网时间:2025年8月6日。

部分海湾国家将资源收益嵌入绿色债券、能源转型融资和跨境基础设施投资安排,^①使资本配置转化为可复制、可扩展的治理工具。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资本被转译为政策工具和合作范式,并推动气候正义、发展融资优先序、转型可负担性等议题进入可执行的制度框架。

第二,议程塑形路径主要体现于扩展性多边机制和南南合作平台。随着金砖合作机制扩容、新开发银行成员结构调整以及相关融资合作推进,阿拉伯国家推动能源安全、发展融资和南方宏观稳定议题获得更高制度权重。^②埃及、阿联酋等国通过正式成员、项目合作和资本投入等方式嵌入机制运作,^③使后者的地理覆盖、资源配置和议题重心发生变化。在发展融资与南南合作中,阿拉伯国家也通过项目对接和跨区域投资网络,将减贫、粮食安全、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等议题转化为项目化、金融化和可复制的制度实践。^④

第三,规范中介型路径主要体现于规则门槛较高、规范竞争较集中的治理领域。阿拉伯国家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则转译和议题重述,将发展阶段差异、能源结构现实和转型成本分担等因素纳入协商框架,从而提高不同制度偏好国家进入全球治理议程的可行性。卡塔尔在地区冲突调解中的长期介入,^⑤沙特与阿曼在也门和平进程中的协调努力,^⑥以及阿尔及利亚在非洲安全议程中的制度性倡议,均通过持续实践积累信誉资本,使其在多边场域中具备一定议程合法性和协调功能。

① Jim Krane, *Energy Kingdoms: Oil and Political Survival in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8–23; Deloitte Middle East, “Gul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Lead Global Growth as Assets Forecast to Reach USD 18 tn by 2030,” March 20, 2025, <https://www.deloitte.com/middle-east/en/about/press-room/gulf-sovereign-wealth-funds-lead-global-growth-as-assets-forecast-to-reach-usd18-tn-by-2030.html>, 上网时间:2025年8月8日。

② “BRICS Expans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from Member States, Partners, and Aspiran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31,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3/brics-expansion-and-the-future-of-world-order-perspectives-from-member-states-partners-and-aspirants>, 上网时间:2025年8月5日。

③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Admits Egypt as New Member,” December 29, 2021, <https://www.ndb.int/news/ndb-admits-egypt-as-new-member>, 上网时间:2025年8月6日。

④ [埃及]拉米娅·穆罕默德·马格里比:《阿拉伯—非洲贸易往来(机遇与挑战)——以埃及与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为例》(阿拉伯文),载《阿拉伯管理杂志》2017年版,第85–112页。

⑤ “Qatari Mediation: Deep International Trust, Pioneering Efforts to Build Peace and Promote Global Stability,” *The Peninsula Qatar*, September 22, 2025, <https://thepeninsulaqatar.com/article/22/09/2025/qatari-mediation-deep-international-trust-pioneering-efforts-to-build-peace-promote-global-stability>,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2日。

⑥ Jon Gambrell, “Saudi Arabia Praises ‘Positive Results’ after Yemen’s Houthi Rebels Visit Kingdom for Peace Talks,” *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21,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saudi-arabia-yemen-war-peace-talks-d2a9ad9efe1ab0b4f5d51597098f46a2>, 上网时间:2025年9月14日。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制度能动性呈现议题分化特征。在资源和资本转译相关领域,其通过制度供给型路径形成实质影响;在扩展性多边机制中,其通过议程塑形型路径推动议程重心调整;在规范竞争集中的领域,则通过规范中介型路径提升协商可行性。这种分层化、功能化实践,使其既能够在全球南方内部提供制度支持与融资方案,又能够在南北之间发挥连接与调和作用,从而推动其角色由制度参与者向制度供给者^①与规范中介者的转变。

(四) 制度再嵌入的边界: 能力拓展与结构约束

制度再嵌入提升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合作网络中的参与深度和影响力。其核心意义并不在于建立一套能够替代现有国际规范的新体系,而在于推动阿拉伯国家从身份认同和政治立场的表达者,逐步转型为制度合作的参与者乃至组织者。伴随多边合作机制不断扩展、功能性平台日益增多以及跨区域联系不断深化,阿拉伯国家开始更多地通过资金支持、议程协调和规则沟通参与国际事务,在部分议题领域逐渐具备了提供合作资源和推动制度对接的实际能力。

这一转变最直观地体现在制度角色的变化上。与冷战时期主要依赖政治动员和象征性代表的参与方式不同,当代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通过机制建设、平台参与和政策工具供给获取持续性的制度影响力。在发展融资、能源转型和数字互联等领域,合作的基础已不再主要是共同政治立场,而取决于资金、技术和组织资源的持续投入。所以制度地位的获得,更多在于能否提供稳定的合作能力,而非单纯的身份标识。

与此同时,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资源优势不再只是外交谈判中的筹码,而是通过基金、投资平台和合作机制进入具体治理实践。主权财富基金、发展融资工具以及绿色投资计划逐渐成为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使减贫、粮食安全、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等议题能够以项目合作的形式持续推进。其关键不仅在于资金规模,更在于资金如何与政策目标、执行机制和合作平台形成有效衔接。当资本投入能够与制度安排形成稳定关联时,合作便有可能从政策宣示转化为持续运转的治理实践。有研究指出,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正从单纯的资本管理工具,逐步演变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对外合作的重要平台,^②

① “Sovereign Wealth Funds 2024 Report,” IE Center/CGC, 2024, https://static.ie.edu/CGC/SovereignWealthFunds_2024report_IECGC.pdf, 上网时间: 2025 年 9 月 8 日; Wahiba Ghardallou, “Gulf States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id and Power Proje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4, No. 6, 2023, pp. 1142–1159.

② Alexis Montambault Trudelle, “Tools of Regime Stabil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Gulf Rentier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1, No. 5, 2024, pp. 1446–1471.

其功能已经扩展至发展融资、产业升级和能力建设等领域,成为资源优势转化为制度影响力的关键渠道。

制度再嵌入带来的另一重变化,是阿拉伯国家在跨区域合作中的桥接功能日趋具体化。所谓桥接,并非抽象意义上的连接南北,而是落实在具体议题的协商过程中。例如在气候治理、能源转型和发展融资等议题上,阿拉伯国家能够将发展阶段差异、制度承受能力以及转型成本分担等诉求纳入讨论框架,在不同立场之间寻求折中方案。这种做法未必能改变既有规则,但有助于扩大协商空间,增加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制度对接的机会。

然而,这种制度影响力仍受到多重因素的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制约源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发展的严重失衡。少数资源富集、国际联系广泛的国家能够在多个平台发挥实质作用,而相当一部分国家仍不具备持续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这种分化使区域层面的协调较难形成稳定机制,也限制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规模。与此同时,合法性和声誉问题同样构成关键约束。资金和项目能够提升国际存在感,但未必带来规范层面的认可。在劳工权益、政治治理和人权等议题上,外部舆论与国际组织的持续关注,往往影响阿拉伯国家相关倡议的接受程度。

资源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则进一步增加了制度供给的不确定性。许多合作项目仍较大程度依赖能源收入与金融市场环境。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或财政压力上升时,部分合作承诺可能陷入落实困境,进而影响制度供给的持续性。多平台并存虽增加了参与机会,但也推高了协调成本。若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绩效评估和经验积累机制,不同合作项目之间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进而削弱制度效果。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绿色金融、数字治理和供应链规则等领域,国际标准体系已趋于成熟。面对这些既有制度安排,阿拉伯国家更多承担协调者和沟通者的角色,难以成为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换言之,其优势更多体现在推动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衔接,而不是重新定义国际标准。

三、制度能动性的生成：地缘资本与角色再定位

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作用正呈现由资源优势向制度能力转化的趋势。在全球南方议题深度嵌入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其地缘区位、能源—金融资源和文明文化资本逐渐被组织为可持续运作的制度资源。连接欧亚非的区位优势、全球能源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地位以及伊斯兰文明共同体的象征资源,共同构成其跨区域治理中的中介优势。这种优势并非源于地理位置本身,而是在规则协调、议题

塑造与政策转译过程中形成的制度能力。由此,地缘资本由静态禀赋转化为动态制度资源,并推动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再定位。

(一) 能源治理的规则化:从资源优势到制度节点

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议程的兴起并未削弱阿拉伯产油国的国际影响力,反而推动其参与方式发生转变。随着全球能源治理重心由资源供给转向规则协调和转型治理,能源不再只是危机时期的外交工具,而日益通过制度安排、市场协调和政策预期管理发挥作用。资源优势由此被重新嵌入国际治理体系,转化为持续性的制度影响力。

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能源市场协调机制的演进上。欧佩克及欧佩克+框架的发展,使能源治理逐渐超越传统的供给调节逻辑。围绕产量配额、政策调整节奏和市场预期形成的协商机制,提升了能源市场运行的可预测性,也为生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稳定平台。在此过程中,影响力已不再单纯取决于资源储量或出口规模,亦体现为对规则运行和市场预期的塑造能力。^① 通过持续参与机制协调,阿拉伯产油国得以在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与低碳转型为阿拉伯国家开辟了新的参与空间。^② 近年来,从区域绿色倡议的提出,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相关议程的组织推动,均显示阿拉伯国家正尝试主动嵌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围绕氢能开发、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系列实践,使其不再仅是能源转型的被动回应者,也逐渐成为相关规则讨论的重要参与方。转型成本分担、发展融资、气候正义与渐进式转型路径等议题被持续纳入国际协商议程,南方国家的发展关切由此获得了更大的表达空间。当然,长期形成的化石能源依赖和产业结构惯性,也使阿拉伯国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合法性与可信度的质疑,这构成其制度影响力进一步扩展的重要约束。

能源与金融之间日益紧密的联动,则进一步强化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枢纽作用。随着主权财富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跨国资本配置和绿色金融工具逐步纳入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资本本身开始承载更强的治理属性。通过投资方向选择、风险评估机制与融资条件设计,阿拉伯国家不仅能够参与新

① Adam Hanieh, “Greening the Gulf? Renewables,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East-East’ Axis of World Energy Debate,” *Development & Change*, 2025, pp. 1 – 2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dech.70006>,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② Aisha Al-Sarihi, “Energy Transition in the Gulf: Best Practices and Limit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17, 2025,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4/energy-transition-in-the-gulf-best-practices-and-limitations>,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3 日。

能源产业链布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转型进程的推进节奏。更重要的是,能源与金融结合打通了原本相对分散的治理领域,^①使气候融资、能源安全与发展融资之间形成更紧密的政策联动。围绕转型成本、技术获取和财政承受能力等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获得了更多进入国际制度框架的机会。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能源治理的规则化并不意味着阿拉伯国家获得了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而意味着其影响力的来源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资源优势仍是重要基础,但真正决定其国际地位的,是参与规则协调、组织议题合作和提供制度性资源的能力。能源转型并未削弱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存在感,反而推动其将传统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具持续性的制度影响力,使其逐步成为连接能源、气候与金融治理的关键节点,并在议程协调、预期塑造和跨领域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 文明资源的制度化：从叙事权威到规范可见性

相较于能源与金融等硬资源,文明与文化资源的制度价值在于能否转化为跨区域可接受的规范表达。去殖民历史记忆、伊斯兰文明共同体和亚非欧交汇的叙事空间,为阿拉伯世界提供跨区域规范转译能力。其作用并非单向话语输出,^②而是在价值诉求与政策协商之间提供解释性接口,提升南方议题的规范可见性与进入性。例如,在发展权和文化多样性等议题上,阿拉伯国家通过将区域经验转译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义叙事,增强南方诉求进入国际多边讨论的正当性;在宗教对话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则通过对话平台和制度化交流机制,将文化差异纳入可协商的制度框架,促进跨区域合作共识的形成。

文明资源的制度化主要依托文化平台和话语基础设施。宗教教育体系、朝觐网络、学术交流机制以及跨国媒体平台,共同构成跨区域文化传播和公共讨论空间,为规范传播与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载体,^③使发展权、文化多样性、宗教宽容等议题能够进入国际讨论框架。与此同时,围绕文明共处、温和伊斯兰等主题建立的对话平台与公共外交机制,^④进一步将巴勒斯坦问题和难民治理等议题转译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语言,纳入国际组织、政策讨论与跨国合作框架。文化

① Li-Chen Sim and Farkhod Aminjonov, “The Evolving Roles of the Gulf States in the Low-Carbon Energy Transition,”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15,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menasource/gulf-low-carbon-energy-transition>, 上网时间:2025年9月28日。

②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4, pp. 57–83.

③ Peter Mandaville, *Global Political Islam*,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61–92.

④ Peter Mandaville, *Global Political Islam*, pp. 93–146; Lina Khatib, *Imag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the Visual in Political Struggle*,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 149–176.

资本的制度效应在于提升议题的国际可见性、规范解释力以及进入制度协商的可能性,^①从而增强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规范影响力。

这种运作方式并不寻求建构替代性规范体系,而是在既有国际秩序中通过规则转译与意义重构,扩大南方议题的协商空间,并提升其规范可见性与制度进入性。然而,文明资源的制度效力仍受到国内治理绩效、外部合法性评价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的制约。象征资本的影响力高度依赖外部信任与内部治理表现,一旦面临治理争议、社会分裂或区域冲突,其规范权威便可能受到削弱。此外,缺乏持续的知识生产与制度支撑,也限制了相关叙事向稳定规范资源的转化。因此,文明资源既是重要的规范资本,也可能成为合法性压力的来源,其作用更应被理解作为一种持续调适与动态嵌入的制度过程。

(三) 安全实践的程序化中介:从依附安排到制度黏性

全球安全格局多极化与地区秩序碎片化,使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策略呈现更强的多向联结特征。在维持与美欧传统安全合作的同时,部分国家积极拓展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行为体的战略联系,通过多元合作降低单一依赖风险,增强政策灵活性和战略自主性。这种调整并非简单的联盟转换或非结盟回归,而更接近“多南绑定”(multi-South alignment)实践,即通过与多个南方及新兴力量建立交叉性合作关系,将安全关系由单一依赖转化为可组合、可调适的制度选择。^②

这一转向首先表现为安全边界的外延化。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关切已由领土防御和政权存续,扩展至海上通道、能源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周边脆弱国家治理等更广泛领域。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通过在非洲之角、红海沿岸与东地中海的资本输出与外交介入,^③形成“前移风险—外部稳态—内部安全”的战略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安全不再单纯依赖军事威慑或双边保护伞,而是被嵌入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和能源合作等制度安排之中,推动安全治理由应急性应对转向常态化管理。

与此同时,安全合作呈平台化与议题化趋势。阿拉伯国家围绕能源安全、基

① Philip Seib, *The Al Jazeera Effect: How the New Global Media Are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8, pp. 105–141.

② Emma Soubrier, “Gulf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Power Competition,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in Washington*, March 24, 2020, https://agsi.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Soubrier_Gulf-Security_Online-1.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3 日。

③ Abdullah Baabood, “How Gulf States Are Reinterpreting National Security Beyond Their Land Borde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 202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8/how-gulf-states-are-reinterpreting-national-security-beyond-their-land-borders-abdullah-baabood?lang=en>,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5 日。

基础设施保护、反恐与网络安全等领域形成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使不同伙伴之间能够根据议题需求进行灵活组合。^① 区域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提供协调平台,也有助于合作关系的制度化积累。安全对话常态化、投资规则制度化以及风险治理标准化,进一步增强了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增强阿拉伯国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战略主动性。^②

更具制度含量的变化体现在冲突调解与危机治理实践中。通过搭建谈判平台、^③提供中立空间和维系沟通机制,部分阿拉伯国家逐步形成可被反复调用的程序性中介能力。其关键不在于个别外交斡旋的成功,而在于持续提供谈判程序和沟通渠道。当停火安排、谈判平台与协调机制得以反复运用时,相关国家便能够积累信誉资本和制度预期,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中介角色。阿拉伯国家作为中层制度行动者的影响力更多源于对平台、程序和议题协调功能的持续供给,从而以有限治理贡献换取制度位置与议程影响力。^④

然而,大国竞争加剧使军购合作、能源联系与外交选择更易被政治化解读,增加政策调整的外部成本。^⑤ 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战略不在于完全摆脱外部依赖,而是通过多元合作与程序性中介降低单一依赖风险,在增强战略自主性的同时维持政策灵活性。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正经历由地缘资本向制度能力转化的过程。能源领域通过机制化协调与金融工具耦合,成为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的重要节点;文化

① [伊拉克]福齐·祖拜迪:《多极世界中的海湾指南针》(阿拉伯文),菲可拉论坛,2023年2月24日,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ar/policy-analysis/albwslt-alkhlyjt-fy-alm-mtd-dalaqtab>,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7日。

② “The GCC in a Multipolar World: Navigating Rivalries and Building Alliances,”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October 15, 2024,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lication/the-gcc-in-a-multipolar-world-navigating-rivalries-and-building-alliances-187380>,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5日。

③ Eleonora Ardemagni et al., “The Security Side of Gulf Visions: Adapting Defence to the Connectivity Age,” *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 2024, <https://www.ispionline.it/wp-content/uploads/2024/03/research-findings-ardemagni-GOLFO-2024-1.pdf>,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7日。

④ Elham Fakhro and Peter Salisbury, “The Gulf States in the Multipolar Transition,” in *POMEPS Studies 54: Debating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Middle East*,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2025, <https://pomeps.org/the-gulf-states-in-the-multipolar-transition>,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8日。

⑤ James M. Dorsey, “Gulf Security: The Arab Gulf States Have No Good Options,”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 1589,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31, 2020, <https://bes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1589-Gulf-State-Security-No-Good-Options-Dorsey-JL-edit.pdf>, 上网时间:2025年10月8日。

领域通过文明资源转译与话语平台建设,提升规范可见性与议题进入性;安全领域则通过平台化合作与程序性中介,增强跨区域治理影响力。三类实践共同推动阿拉伯国家由规则接受者逐步转向具备制度供给、议程协调和规范转译能力的中层制度行动者。

但与此同时,能源转型压力、文化合法性争议以及大国竞争带来的战略约束,也持续影响其制度影响力的稳定性与外溢性。因此,阿拉伯世界的角色再定位并非线性演进,而是在资源优势、制度能力与外部结构之间持续调适的动态过程。其未来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优势的持续转化能力,更取决于跨领域协同能否进一步制度化,以及能否有效应对外部合法性压力与内部治理挑战。

四、结语

全球南方重组与国际政治经济多极化叠加推进,使全球治理由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逐步转向多中心、多平台并存的运作格局。随着多边机制扩容和跨区域合作深化发展,制度供给不再由单一中心垄断,而呈现竞争性、组合化与碎片化并存的特征。在这一结构转向中,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参与方式发生显著变化。相较于冷战时期以身份认同、政治动员和立场表达为主的参与模式,当代阿拉伯国家更多通过制度嵌入、议题协调和公共产品供给参与全球治理,并逐步在既有制度体系内部扮演具有功能属性的中层制度行动者角色。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对既有国际秩序的整体性替代,而更多体现为通过制度再嵌入扩展行动空间,并在特定议题领域积累制度影响力与治理能动性。

阿拉伯世界的角色转型具有相对清晰的历史谱系。去殖民经验与第三世界团结传统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身份叙事和道义资本,并在冷战时期通过区域组织、资源联盟和外交动员持续介入国际议程。然而,在两极对抗、外部干预和区域分化的影响下,其合作长期呈现“议题动员强而机制供给弱”的特征,难以沉淀为稳定的制度安排。进入 21 世纪,跨国议题的技术化、金融化和治理化显著提高了制度供给的重要性,而多中心治理结构则降低了制度参与的排他性门槛,使阿拉伯国家无需以整体代表姿态介入国际事务,而能够通过议题选择与功能嵌入实现差异化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其资源优势、地缘位置和文明资本逐步突破传统资源政治逻辑,被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制度资源,并通过融资安排、规则对接、项目协同和规范转译等方式嵌入全球治理网络。金砖机制、全球发展倡议、中阿合作论坛与“一带一路”等多边平台,在实践层面构成其制度再嵌入的关键接口,同时也为其规范中介化与制度供给能力的外化提供

现实场域。

阿拉伯国家角色再定位能够由结构机会转化为持续实践,主要源于结构性、资源性与主体性三类动力的共同作用。首先,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与治理绩效层面积累的合法性压力,为多边机制扩展与功能平台重构提供了持续动力;其次,能源—金融资本、地缘枢纽地位以及跨区域联通能力,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并能够通过主权资本、绿色金融和跨区域投资网络实现制度化转译;再次,部分国家推动经济多元化、风险分散外交和战略自主的政策调整,使其逐步由制度参与者转向制度供给者,并在斡旋外交、发展融资和跨区域合作中积累制度信誉。由此,制度再嵌入并非被动适应外部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是结构机会、资源转译与主体策略共同塑造的制度过程。

阿拉伯国家的制度能动性主要通过能源治理、文明资源和安全实践三条相互关联的路径展开,并共同构成规范中介化的现实表现。其一,在能源与气候治理领域,通过欧佩克及欧佩克+框架下的机制化协调,以及能源资本与绿色金融工具的结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影响治理节奏、市场预期和规则运行方式的制度能力,并在全球能源—气候治理网络中形成关键节点地位。其二,在文明与文化领域,通过跨文化对话平台、公共外交网络以及规范转译实践,提高发展权、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宽容等议题的国际可见性与制度进入性,为不同制度偏好之间提供沟通与协调的媒介。其三,在安全领域,通过多元伙伴关系、“多南绑定”实践、平台化合作以及冲突调解机制建设,逐步形成可被反复调用的程序性中介能力,并在危机治理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积累制度信誉与议程影响力。三条路径相互支撑,共同推动阿拉伯国家由规则接受者逐步转向兼具制度供给、议程协调和规范转译功能的中层制度行动者。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制度能动性的增长并非均衡扩展,而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化与功能化特征。在资源和金融优势较易转化为制度工具、制度门槛相对可控的领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制度供给与项目外溢;而在规范竞争更为激烈、技术标准和合规要求更高的领域,其影响则更多体现为规则转译、议程桥接和跨平台协调,而非主导性规则生产。因此,中层制度行动者地位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对既有制度体系的功能嵌入、跨平台协同和可操作方案供给。其优势在于能够连接不同治理网络、协调不同制度偏好并提供跨区域合作渠道,而其局限则在于制度影响力的外部可接受性与内部一致性始终受到结构条件约束。

但这一转型同样存在清晰边界并面临内外制约。区域内部国家能力差异与政策偏好分化削弱了集体行动的稳定性;能源转型背景下的收益结构变化与路径依赖压缩了资源型制度供给的可持续空间;既有国际规则体系、技术标准和金融合规门槛限制了制度影响的外溢深度;多平台并存虽然拓展了制度参与空间,

却也加剧了治理碎片化和执行链条脆弱性。此外,文明资源和规范叙事的制度效力仍受到外部合法性评价与内部治理现实之间张力的影响,而安全领域的程序性中介实践则持续面临大国竞争和地区冲突外溢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阿拉伯国家制度地位能否由阶段性提升转化为长期性积累,关键取决于跨领域协同能否进一步制度化、资源转译能否有效对冲周期波动,以及其能否在外部合法性压力与内部治理挑战之间维持相对稳定的均衡。

阿拉伯世界角色再定位的意义并不限于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而在于其折射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重构方式的深刻变化。相较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权力转移或实力竞争解释新兴行为体崛起的分析路径,阿拉伯国家近年来更多通过制度参与、规范协调和议题塑造提升国际影响力,其制度实践体现出由资源优势向治理能力、由身份认同向功能定位、由政治动员向制度供给转化的演进逻辑。这种变化表明,全球南方内部正在形成更加多元的制度分工,不同国家依据资源禀赋、制度能力和战略定位,在全球治理中承担差异化角色,共同推动南南合作由价值认同逐步迈向机制协同。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既是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南北制度体系、协调不同发展诉求的重要桥梁,其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全球南方参与国际制度变革的现实路径,也说明中等力量并非只能依附既有国际制度,而能够依托功能性制度供给和规范中介实践,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断拓展制度空间,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包容、多元与协商性的方向演进。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阿拉伯国家制度能动性的差异化来源,考察资源禀赋、国家能力和外交战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持续追踪其制度供给的工具链条、绩效评估和外部接受机制。同时,也有必要将阿拉伯国家与其他全球南方重要行为体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准确把握中层制度行动者在多极化与多中心治理背景下的形成机制、稳定边界及其长期演化方向。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